

清前中期皇帝典学述论

稷 若

“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①。国君典学，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所谓“大学在邦，天子居中曰辟雍，诸侯曰頖宫。”“頖”同“颿”，含义是散于四周。典学规制历代相沿，大同小异。汉唐以后皆以“经筵”和“日讲”形式，将经世治国之学作为皇帝学习研讨的内容，兼及历代兴亡得失。

历代国君典学，目的主要两个：一在启沃圣智圣德，局限于汲取历代统治经验，提高国君理政的必要素质；二在崇学重教，礼敬师尊，昭示“文治”，以传统伦理、道德、纲常“迪化”臣民。

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出自“循古之典”和对中原传统文化吸收、利用的需要，“稽古典学”颇受重视。自顺治至雍正朝屡有“典学”奏疏、诏谕。由于皇帝典学借鉴经史，注重“学以致用”，直接决定国家的用人吏治、行政课律、军事方略诸大端，甚至影响到封建政治的相对清明。因此，清前中期皇帝典学对于中世纪末叶盛世的出现以及由此促进多民族统一帝国的形成，发生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 满族入关前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态度

历史上辽东及其北部地域开发较晚，长期为渔猎、游牧民族的生息地。明初，复兴并南迁的女真人仍然处于“屋居田作与中

国同，射猎侵掠与北虏同”的生活状态^②，人文环境粗放，传统文化积累薄弱。

任何时代统治秩序的形成，都需要有反映经济基础的文化秩序相伴随。复兴后的女真上层统治集团雄心勃勃，急欲建立类似十二、三世纪金帝国那样的统治秩序。因此，在女真首领面前存在着如何对待汉文化，如何使自己晚进的民族文化与发达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的问题。事实上，清入关前，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已经开始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吸取。

初始，努尔哈赤致力武功创业，缺乏“文治”意识。

明万历二年(1574年)努尔哈赤在外祖父王杲处被明兵俘获，投效李成梁麾下，时年15岁。四年后，他逃离明军，往来于开原、抚顺间，从事集市贸易，进一步结识汉人，学习汉语，接受汉文化薰陶^③。努尔哈赤曾表示自己能“看《三国》、《水浒》二传，并自谓有谋略。”^④他的“谋略”被他后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所证实。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策略，用兵统一女真各部。后来他起兵反明，攻占城池多以智取，而不轻易强攻。建立后金以后，他训谕诸贝勒：“在我大金国东北方有朝鲜国，西北方有蒙古部，这两方对我都不绥服。当此之时如西伐尼堪大国(指明朝政权)，家则不安。”^⑤对此努尔哈赤采取通婚蒙古上层、睦邻朝鲜的政策，申明“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永结